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求 真 文 集

杨发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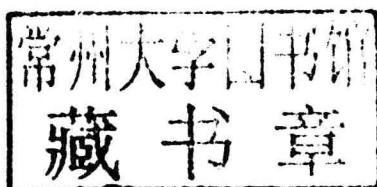


新疆人民出版社



求 真 文 集

杨发仁 著



●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求真文集 / 杨发仁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0.6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ISBN 978-7-228-13385-7

I . ①求 … II . ①杨 … III . ①地区经济 - 经济发展 -
新疆 - 文集 IV . ①F127.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3443 号

责任编辑 贺 灵

整体设计 王 洋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991)3652361
印 刷 新疆八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9.875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定 价 65.00 元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编委会

一、编辑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任委员：吴福环

副主任委员：阿不都热扎克·铁木尔

委员：苗普生 张运德 阿布都热扎克·沙依木 库兰·尼合买提
刘仲康 潘志平 董兆武 田卫疆 齐清顺 王 宁 马品彦
郭泰山 刘国防 阿不都热依木·哈力克 阿班·毛力提汗
米娜娃·阿不都热依木 白 莉 艾比布拉·阿不都沙拉木
李晓霞 木拉提·黑那亚提 李树辉 宋建华 柴 林

主编：吴福环

二、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

主任：李行力

成员：王 磊 古丽巴哈尔

序

哲学社会科学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责。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人类文明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发展前景美好。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快速变迁的今天，新疆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新疆社会科学院正式挂牌成立于 1981 年，而其前身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疆社会历史调查组、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历史研究室、70 年代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委民族研究所等机构。长期以来，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新疆改革开放及社会稳定大局，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社会田野调查和系统精专的学术研究。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踏遍天山南北、绿洲草原，身影留在农家小院、牧民毡房、工厂车间、学校课堂、兵团连队、军营哨所，查阅和整理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图书档案，撰写调研报告，发表学术论著，领域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新疆历史、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民生、民族、宗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化以及新疆周邻的中亚等国际问题。几十年来，这些研究成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

艰苦的脑力劳动,几十年“冷板凳”,几十年“爬格子”;身居陋室,心怀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春蚕吐丝,似蜡烛燃烧。这些正是中国千千万万爱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几十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几代专家学者出版了数百上千部著作、数万篇论文和研究报告,其中蕴含着他们的心血和赤诚。他们是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见证人。2008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决定支持和资助院里具有正高职称(研究员、教授)的专家学者每人出版一部文集,先从离退休专家学者做起,逐步扩展至在职者,每人从自己毕生发表的大量论文中精选数十篇代表作,结集成书,经新疆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后付梓出版。每一部文集都是作者辛勤耕耘的结晶和智慧的阐发。阅读这一部部文集,我们可以看到每位作者的学术历程和进步,也可以从中看到新疆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历程。这套文库的出版,是多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科研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是奉献给社会的一批精神财富。同时,这些成果对于年轻研究人员来说,也是一套富具价值的学习资料。

我衷心祝贺这套文库的顺利出版,并祝愿新疆社会科学院不断推出更多更新更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从而为推进新疆的跨越式发展、社会长治久安以及各民族文化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

吴福环(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2010年10月10日

自序——我的社会科学研究生涯^①

我是从 1978 年开始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当时在全国科学大会的鼓舞下,在《新疆日报》发表了我的一篇理论文章,题目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署名辛立,从此开始了我的科研生涯。这以后的 30 年内,主要从事新疆经济与民族问题研究。在报刊上共发表理论文章 184 篇,计 114 万字。平均每年发表理论文章 6.1 篇,计 3.8 万字。所发表的理论文章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的有 12 篇,被全国其他有关丛书编纂部门收录的有 50 多篇。另外,还撰写研究报告 6 份,分别报送了中央统战部、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合著)、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合著)等领导机关,受到这些领导机关的高度评价。主编专著有《无神论教育读本》、《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读本》、《维护祖国统一保持社会稳定》、《亚欧第二大陆桥研究》、《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改革与发展研究》、《西部大开发与民族问题》等 11 本,共 160 余万字。尤其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主持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研究》,是新疆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理论研究的奠基之作,所提决策建议大都为中央[1997]7 号文件所采纳,在社会上和理论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学术观点被国内学术界广泛引用。

独立撰写著作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邓小平民族理论通俗读本》、《邓小平民族理论及其在新疆的实践》、《新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民族工作》,共 70 万字。参与合著有《维护祖国统一简明读本》、《邓小平民族理论与实践》、《迈向 21 世纪的新疆》,参与撰写部分约 5 万字。

近 30 年来,共获得全国和自治区主管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机关颁发的著作与论文奖 17 项,其中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1 项,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4 项。并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自治区先进科技工

^① 本文是我 2008 年 12 月 6 日在新疆社科院、新疆社科联青年科研人员培训班上讲话的一部分。

作者一、二等奖各一项。1993 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另外,作为首席专家,和徐玉圻同志一起,于 2007 年共同主持编写了新疆高等院校公共理论课地方课程教材《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为 24.6 万字。个人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提高民族工作水平研究》,国家社科规划办 2007 年年底验收时被鉴定为优秀等级,这一著作即将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而且,由于论文入选,我连续四次出席了中央有关部门共同主持召开的全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理论研讨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有幸聆听了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和胡锦涛总书记的三次重要讲话。

近 30 年来,我在科研上所以取得一些成就,是自治区领导,特别是王恩茂同志、宋汉良同志亲切关怀和鼓励的结果,我至今一直对他们非常怀念。1985 年初我在自治区党校工作时,当时国内理论界和新疆地区对新疆要不要提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在认识上不很一致,我给王恩茂、宋汉良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们转呈中央政治局,建议坚持新疆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提法。第二天我就接到王恩茂、宋汉良同志的电话,他们分别表示支持我的建议,并将我的建议书呈报了中央政治局。1992 年,我出版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小册子,王恩茂同志于 1992 年 4 月 2 日,亲自撰稿为我这本书写了序言。序言中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杨发仁同志著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一书,理论联系实际,从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坚持正确观点,反对错误观点。这对于贯彻党的民族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祖国统一,增强各民族大团结,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都是有意义的。这是一本向各族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好读物,对各族干部和人民群众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将有所裨益。”这对我教育鼓舞很大。同时,我在科研上所以取得一些成就,也是和新疆社科界的同仁和有关报刊对我的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借此机会,我向这些支持我的报刊和同志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最近,新疆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决定给我出版文集,我对此深为感动。我从自己已发表的文章中挑选了一部分,汇编成册,署名为《求真文集》,以示自己一生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的心愿,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目 录

序	(1)
自序——我的社会科学研究生涯	(1)

政治经济理论篇

全面理解和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	(1)
初级阶段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科学成果	(6)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所有制结构的改革	(14)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	(21)
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1)
试论我国资源配置模式的转换	(37)
全面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	(44)
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把西部大开发推向新阶段	(50)
国家政策倾斜是西部大开发的生命线	(59)
西部大开发与社会人文环境建设	(66)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重大举措	(76)
“五个统筹”是重大的理论突破	(84)
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体系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87)
陈云同志“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94)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102)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107)

民族理论政策篇

邓小平民族理论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	(111)
-------------------------------	-------

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科学思想体系	(120)
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实践特征与时代特征	(126)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民族	
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30)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疆民族关系特点初探	(140)
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反对民族主义	(145)
“双泛”的由来及其反动思想体系	(152)
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是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	(161)
民族分裂主义思潮和宗教极端主义思潮是新疆“三股势力”	
猖獗的思想根源	(172)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历史研究的指南	(181)
高举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旗帜	(196)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207)
全面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	(214)
把握“两个共同”民族工作主题,开创民族工作新局面	(230)
执政能力建设与民族工作——论新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235)
不断提高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能力	(243)
民族发展程度取决于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	(249)
民族和谐是新疆和谐的基本保证	(253)
关于反对民族分裂 保持新疆长治久安的对策建议	(259)
“7·5”事件反思 “东突”势力罪责难逃	(280)
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	(288)
各族青年学生应当成为维护民族团结的先锋	(297)

新疆发展篇

科学发展观是促进新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304)
第二亚欧大陆桥的贯通及其对中国对外开放和对中亚国家发展	
同亚太地区联系的意义	(314)

坚持正确的发展观	(325)
新疆实施优势资源转换战略应该有新的思路	(330)
新疆要加大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力度	(340)
股份合作制在昌吉州显示活力	(347)
新疆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体系构想	(355)
新疆应该确立跨越式发展思路	(361)
在自治区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研讨会上的发言	(366)
新疆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研究	(370)
对新疆新型工业化的几点思考	(378)
扎实推进新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85)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	(394)
新疆对外开放应当有新的思路	(398)
重视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401)
重点扶持南疆(三地州)发展 逐步缩小区内南北发展差距	(407)
生态文明:新疆经济发展的重大方略	(415)
坚持科技创新 促进新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419)
试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戍边使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	(425)
屯垦戍边文化万古长青	(429)
解放思想是新疆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	(433)
始终把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的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443)
新疆团结奋斗与繁荣发展的六十年	(448)
附件1 我见到了中央四代领导人	(455)
附件2 我30年来发表的文章暨提交的研究报告目录	(460)

全面理解和贯彻执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党中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做出的更加深刻和科学的概括。加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全面正确的理解,对于我们防止、克服“左”的僵化观点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及干扰,加速新疆的开发和建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是以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作为依据的。它体现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表明,我们什么时候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能对我国国情及其现状做出正确分析,我们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比较正确,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就比较顺利;相反,脱离了中国实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会发生偏差,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遭受不应有的挫折和损失。正是鉴于这一历史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全党要重视对我国国情的分析和研究,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十二大政治报告,以及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都一再阐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央的这一正确分析,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国情的认识更加符合实际,是对我国实践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认识上的一次升华。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程度较低这两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方面具有社会主义社会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已在我国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已成为我国不可逆转的前进方向;另一方面,它还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特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不能不带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这不仅表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尤其表现在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人民生活还不富裕,在较长时间内尚不能完全摆

脱贫困的面貌。这一历史时期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因而必须把全党工作的重点由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方针,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的社会主义,然后才能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我们党首先认清了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心一意搞四化,聚精会神谋发展,使党的路线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从而为我国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所以,深刻地认识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总钥匙。只有首先认清这一点,我们才能保持清醒头脑,既同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倾思潮划清界限,又可防止和克服“左”的僵化观点的影响和干扰,始终沿着党的路线指引的方向前进。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这两者不是纲和目、主和次的关系,而是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唇齿相依,不可分割。也就是说,一方的存在和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治国的总原则,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是使改革、开放、搞活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轨道,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改革、开放、搞活势必搞不下去。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党的总方针、总政策,是我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摆脱贫贫困面貌、建设比资本主义更具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不改革、开放、搞活,就不能纠正旧体制的种种弊端,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社会主义就没有多少吸引力,四项基本原则当然也坚持不好。因而这两个方面是不能互相排斥的。排斥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必然导致否定改革开放;排斥改革、开放、搞活,四项基本原则也会失去同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活力,实际上也必然导致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所以,这两个基本点,都是我们制定和贯彻执行各项具体政策的基础。离开任何一个基本点,都不可能全面、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二是彼此渗透,互相促进。也就是说,这两个基本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促

进,互相转化。我们要坚持的社会主义,决不是贫困的社会主义,而是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而要摆脱贫穷的社会主义只能依靠发展生产力,不能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讲社会主义,所以必须对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进行改革。因为改革不仅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必由之路。不改革,不仅生产力发展不了,而且难以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站稳脚跟,那样,社会主义就会停滞,就会僵化,就不可能有希望。因此,改革和开放是社会主义的天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然要坚持改革。同样,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都在客观上要求进行改革。不改革,能改善党的领导吗?能逐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吗?能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实行改革、开放、搞活,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崭新内容,是四项基本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运用和发展。当然,我们所说的改革、开放、搞活,它决不是中性的东西,而是具有鲜明政治特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策,因而它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比如,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的改革,必须以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前提,而不能违背这个前提。政治体制改革也必须以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前提,而不能损害、削弱党的领导和破坏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根本的政治制度。所以,改革、开放、搞活本身就包含着四个坚持的内容。但是,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促进和相互转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在于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

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必须不断地排除各种干扰,既要反对“左”的干扰,也要反对右的干扰。这两种干扰,焦点都集中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面,一个是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一个是改革、开放按照什么方向进行的问题。不排除这些干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就不可能顺利进行。

去年年底在学潮问题上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泛滥,就是一种右的干扰。几个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主张“全盘西化”,想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一个是否定社会主义,一个是否定党的领导,这就是他们用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对待改革的实质所在。它清楚地告诉我们,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对待改革,必然导致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显然是违背全国人民的利益的,理所

当然地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存在于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还要进行几十年。这种斗争的长期性不仅有国内外阶级斗争方面的原因，还有社会生产力水平低的原因。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还远远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人们已经初步见到社会主义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但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还会有一定的市场。这就要求我们长期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引导人们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方面要靠正面教育的深入，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深入到人们的头脑中去，以增强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识别力、免疫力和抵抗力；另一方面还要靠改革，以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社会主义优越性日益显示出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市场就会逐步缩小以至趋于消失。

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党的路线不仅有右的干扰，还有“左”的干扰，而且最大的危险还是“左”的干扰。我们不能因为在思想战线上一度发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问题，就忽视了“左”的思想倾向的危险。这是因为“左”的思想影响是在比较长的时期中形成的，几乎已经成为社会上的一种习惯势力，变成某些陈旧的凝固的观点，因而纠正起来很不容易。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在注意克服“左”的思想倾向，但“左”的思想影响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一有机会就会冒出来。对此我们决不可以估计低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固然是我们立党治国的根本，但也不能以这四个坚持来否定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把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允许一部分人依靠勤劳守法先富起来说成是“搞资本主义”。这种离开生产力发展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抽象地讲社会主义原则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在实践中也是非常有害的。我们党内很多“左”的思想影响之所以能够存在，与这种陈旧的、僵化的观点的存在关系极大。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决定历史进程的，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因素。衡量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够格不够格，我们的政策对头不对头，最根本的是要看能否最有效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地、不断地得到提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不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只能是一种纯而又纯的单一的公有制，只能是排斥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计划产品

经济体制,只能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领导体制,甚至把平均主义、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当做社会主义,那就必然陷入主观随意性,这种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是实践中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些分析表明,如果我们以僵化的观点来看待四项基本原则,把某些过时的或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当做不可移易的真理,用旧眼光、旧框框来看待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事物,就必然导致否定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政策,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左”的那些东西,往往更容易迷惑我们的同志。所以,为了全面、正确地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我们不仅要注意排除右的干扰,更要注意排除“左”的干扰;不仅要警惕右的东西,主要是防止“左”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政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本文原载《实事求是》1987年第5期)

初级阶段理论是对社会主义 再认识的科学成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为认清我国国情,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开拓了道路。正是在这样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上,我们党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抛弃了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对这个理论作了精辟阐述。它标志着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历史性飞跃的高度,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固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结晶

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也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根本前提。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我国国情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而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结论,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结晶。

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历史分析和逻辑论证的统一。列宁说过:“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①今日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我们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出发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